

〔宋〕蘇舜欽著 傅平驥 胡問陶 校注

蘇舜欽集編年校注

巴蜀書社

I214.42

53

BH1515

蘇舜欽集編年校注

〔宋〕蘇舜欽著 傅平驤 胡問陶 校注

巴蜀書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B 781515

責任編輯：王大厚

封面設計：李文金

蘇舜欽集編年校注

〔宋〕蘇舜欽著 傅平驥 胡問濤校注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鹽道街三號)

廣元市南河印製廠製型 巴蜀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張27.5 插頁4 字數480千

1991年3月第一版 199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冊

ISBN7—80523—329—2/1·146

定價：10.78元

前 言

蘇舜欽是北宋中期的一个愛國志士和傑出的文學家。他是以范仲淹為領袖的政治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又是以歐陽修為盟主的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倡導者。有《蘇學士文集》傳世。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蘇易簡之孫，蘇耆之次子。祖籍綿州鹽泉（四川綿陽市東），宋開封（今屬河南）人。他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宋仁宗天聖六年（一〇二八），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與穆脩、尹洙等倡導「古文歌詩」，在汴京文壇上嶄露頭角。次年，調滎陽（今屬河南）尉。八年（一〇三〇），娶屯田郎鄭希甫之女。明道元年（一〇三二），隨父至河東轉運使治所。景祐元年（一〇三四）三月，進士及第，授光祿寺主簿、知亳州蒙城縣（今屬安徽）。次年春，奔父喪至陝西轉運使治所長安（陝西西安）。鄭氏病歿。躬耕守制。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年底，再娶知并州（山西太原）杜衍之女。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四月，以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今屬河南）。康定元年（一〇四〇），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次年夏，赴會稽（浙江紹興）奔母喪。慶曆二年（一〇四二），聚族旅居山陽（江蘇淮安）守制。三年（一〇四三），以參知政事范仲淹之薦召試，授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四年（一〇四四），在京與歐陽修、梅堯

臣等酬唱。十一月，蘇舜欽依慣例賣廢紙主辦進奏院祀神宴會，遭保守派誣陷，「以監主自盜定罪、減死一等科斷」，被罷官爲民。五年（一〇四五）初春南下，四月抵達蘇州（今屬江蘇），築滄浪亭定居。六年（一〇四六）復有浙東之行。八年（一〇四八），復官爲湖州（今屬浙江）長史，未赴任。十一月，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一歲。

蘇舜欽生活和從政主要在保守派頭子呂夷簡當政的年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益尖銳，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內憂外患都很嚴重，北有遼的威脅，西有夏的侵擾，形成了冗費、冗兵的積貧、積弱之局面。他積極投身政治和詩文的革新運動，在憂國傷時和患難悲憤中度過短暫的一生。

蘇舜欽的政治抱負和政治活動

蘇舜欽不僅是一個文學家，他具有政治家的謀略和才識。《宋史·蘇舜欽傳》說他「少慷慨有大志」，這大志就是他說的：「念昔年少時，奮迅期孤騫，筆下驅古風，直趣聖所存。山子逐雷電，安肯服短轅？便將決渤澥，出手洗乾坤。」（《夏熱晝寢感詠》）這「洗乾坤」的抱負，就是致君澤民：「朝廷比多事，亦合強激昂，……奮舌說利害，以救民膏肓。」就是安邦定國：「不然棄硯席，挺身赴邊疆，喋血塵羌戎，胸膈森開張，彎弓射攬槍，躍馬埽大荒，……願當發

策慮，坐使中國強，蠻夷不敢欺，四海無災殃。」從而做一番一功勳入丹青，名迹萬世香」的「丈夫事」（《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他不僅有志於改革西崑浮靡文風，而且「潛心策書」，研究「前古治亂之根本」，熟知「當今文武之方略」（《上集賢文相書》），以天下為己任。歐陽修很賞識他的政治才幹，認為他有宰輔之才：「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膺？羣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答蘇子美離京見寄》）

正因為蘇舜欽是一個改革志士，他積極地建言革新。他進言的途徑和方式有三：一是直接向宋仁宗上疏，要求革除時弊。二是勸說文人杜衍犯顏直諫，要他盡忠職守。三是支持范仲淹的政治革新，向他提供意見。

直接上疏皇帝，意在「致君」。蘇舜欽從傳統的儒家忠君思想出發，把治國平天下的希望寄托在宋仁宗的身上。他認為君臣之間應當是：「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火疏》），他確實做到了不怕丟官、不怕殺頭。《蘇學士文集》現存奏議九篇，就是他「致君」的明證。

天聖七年（一〇二九）閏二月，宋仁宗下詔復制舉。蘇舜欽立即上《投匭疏》，縱論四制十一科取士之弊。

同年六月，供奉「天書」的玉清昭應宮毀於大火，劉太后、宋仁宗意欲重建。蘇舜欽登聞獻《火疏》，直接把天災歸罪於人禍，大膽指出：「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澇，……百姓

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於內，征役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他反對重建玉清昭應宮，并要求宋仁宗「采吉士，去佞人，姑務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

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五月，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上疏指責朝政，得罪了宰相呂夷簡，范仲淹及其支持者余靖、尹洙、歐陽修同遭貶謫，宋仁宗并下詔戒百官越職言事。蘇舜欽即書寫《聞京尹范希文謫鄱陽尹十二師魯以黨人貶郢中歐陽九永叔移書責諫官不論救而謫夷陵令因成此詩以寄且慰其遠邁也》，同時上《乞納諫書》，稱贊范仲淹「剛直不撓」，揭露呂夷簡「蔽塞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強調此詔「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

景祐四年（一〇三七），蘇舜欽又上《論五事》。指出：「州縣之吏，多是狡惡之人」，「此輩凶人，唯利是嗜，……實政理之巨蠹，黎民之大害焉。」他一方面要求嚴懲貪官污吏，另一方面則建議「卹貧寬疾」，置悲田養病坊收容乞丐。

同年十一月，河東大地震。蘇舜欽毅然上《詣匭疏》，批評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既為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辯白，又指責宋仁宗「隔日御殿」「多引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他并且彈劾宰相王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參知政事石中立「物望甚輕，人情所忽」，要求「即時罷免，別選賢才」。

康定元年（一〇四〇），宋夏戰事激烈。蘇舜欽先後上《乞用劉石子弟》、《乞發兵用銀牌

狀》及《論西事狀》，後文反對「輕舉」，主張「堅壁清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這與范仲淹的意見完全一致。

同年十一月，宋仁宗傳旨賜「醫卜庸流」兩所住宅。時任監在京樓店務的蘇舜欽却上《論宣借宅事》，要求皇帝收回成命。

這些上疏批評皇帝，彈劾宰相，議政論軍，指責時弊，反映下情，為民請命，顯示了蘇舜欽政治家的才略和膽識，表現出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品格和氣節。正如歐陽修所說：「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他的「致君」也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續資治通鑑·宋紀·仁宗寶元元年》記載：「（二月）庚午，詔自今日御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勸說杜衍直言進諫，要求丈人不負衆望。寶元元年（一〇三八）正月，蘇舜欽因河東地震，寫信給知并州的杜衍說：「今所屬有此災異，故當憂思本朝，建言時病以箴之，不可懷忠不發，默默緘口，如常常者所爲。……君子之爲，不畏時王之罰，而畏衆人之議；或衆議喧嘩，不可蓋塞，則雖終日九遷，亦足羞也。」（《上京兆杜公書》）康定元年（一〇四〇）九月，杜衍被任爲樞密副使，但因受人牽制，不能暢行其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冬，蘇舜欽在《答杜公書》中，勸他直言進諫，如勸諫無效，則薦賢代己，潔身引退，其出發點不在於個人之進退得失，而是出以濟世安民之心：「若丈人得盡其才，使天下和平，某雖老死剛畝，終身不入仕宦，如在三

旌之位也。」真是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北宋以來，土地兼并激烈。冗官的俸祿和冗兵的糧餉逐年增多。景德元年（一〇〇四）「澶淵之盟」以後，宋每年要向遼繳納銀二十萬、絹十萬的「歲幣」。景祐元年（一〇三四）開始，宋對夏的戰爭屢戰屢敗，遼又乘機敲詐勒索。蘇舜欽在《詣匭疏》中說：「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雙重壓迫下的廣大農民，窮苦不堪，不享有免稅免役特權的中小地主，亦受其苦。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在今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發生了規模不等的農民起義或兵變。以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歐陽修等為代表的改革派，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蘇舜欽為改革派領袖范仲淹出謀劃策，起了智囊作用。

從景祐三年（一〇三六）起，蘇舜欽就一貫擁護范仲淹的政治改革活動。康定元年（一〇四〇），范仲淹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蘇舜欽在《上范希文書》中，向他提出主守不主攻的建議。慶曆三年（一〇四三），范仲淹任參知政事，與樞密使杜衍、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銳意革新，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措施。慶曆新政以整頓腐朽的官僚制度為中心，有利於改善宋王朝的專制統治，但也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遭到保守派反對。改革中也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弊病，招致民衆非議。慶曆四年（一〇四四）五月，蘇舜欽為反映民意和推動改革，寫了《上范公參政書并詒目七事》：一是建議培養宗室

子，爲國之儲貳早作準備。二是建議整頓禁旅紀律，加強諸營教習。三是建議改革財政，富國利民。四是建議減省皇室經費，先從放減宮女開始。五是建議徵戍邊稅，先自仕祿之家開始。六是建議博採衆議，取消執政大臣私第不會賓客之詔。七是建議執政大臣專職負責，由范仲淹、富弼分管西北二邊之事。上書及謄目有批評，有建議，并告誡范仲淹不要「畏縮循默」。

在推行新政時，蘇舜欽的岳父杜衍是樞密使，後又升任宰相，是改革的支持者。范仲淹是蘇舜欽的上司和朋友，又曾舉薦蘇舜欽召試館職。因此，保守派王拱辰、劉元瑜、魚周詢一伙便以進奏院祀神宴會事作爲突破口，誣陷蘇舜欽，以達到打倒杜衍、范仲淹和推翻新政的目的。蘇舜欽對這一點認識很清楚，他說：「始者，御史府與杜少師（衍）、范南陽（仲淹）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內不自平，遂煽造詭說，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窮鞫，撈掠以求濫，事亦既無狀，遂用深文。」（《上集 賢文相書》）結果，蘇舜欽獲罪，十多位學者名流如王洙、宋敏求等全部受累，杜衍、范仲淹、富弼相繼貶謫。於是，慶曆革新宣告失敗。

蘇舜欽做地方官的時間不長。景祐元年（一〇三四）知蒙城縣，初到任即「竄一巨豪，杖殺一點吏」，一邑肅然，離任時「邑民遮道助嗷泣」（《上三司副使段公書》）。寶元元年（一〇三八）知長垣縣，「益勸精力以事」（同上），逾年就取信於吏民。總之，他做地方官「所至皆有善政」（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在朝廷則積極參加革新活動，爲慶曆新政作出了貢獻。

和犧牲。對他，的確「不可以區區文人才士目之矣」（徐惇復《蘇子美文集序》）。

蘇舜欽的文學思想和詩文創作

蘇舜欽是北宋中期的詩人文豪，他的詩文創作對開創一代宋詩宋文之風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和影響。

《蘇學士文集》卷十三《石曼卿詩集序》，是一篇頗有見解的文章。人們研究蘇舜欽的創作思想，主要依據這篇文章。但據我們考證，此文非蘇舜欽作。石介《徂徠集》（文淵閣本）卷十八有此文。石介字守道，天聖進士，官至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積極支持慶曆革新，主張道統文統合一，推崇韓愈，提倡古文，反對西崑文風，與石曼卿亦有交往。宋魏齊賢、葉棻編《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七收有此文，題石守道作。不著編輯者名氏《宋文選》（《四庫全書總目》謂集於宋室南渡前）卷十七，收此文亦題石守道作。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一云：「石曼卿詩……，晚得其集，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豪於詩。」可見宋人都以此文為石介的作品。《蘇學士文集》中沒有專門的系統的文論之作，雖然如此，還是可以從隻言片語中，看出蘇舜欽的文學見解和創作態度。

關於文與道的關係，他提出了文歸於道的主張。《上三司副使段公書》說：「嘗謂人之所以

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也。故每屬文，不敢雕琢以害正。」言而成文，必須符合道義，而道義的內容，必須能够澤及民物，有利於社會，造福於民衆，這樣的文章才合於正道，才能永遠流傳。重道，就是重思想、重政治、重美刺、重內容。因此，他慨嘆「風雅久零落」（《詩僧則暉求詩》）。風雅，指《詩經》中的國風和大雅、小雅。以「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爲內容的風詩，以揭露現實爲特徵的雅詩，奠定了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基礎。蘇舜欽爲風雅傳統的衰落痛心疾首，與陳子昂之「文章道弊」（《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同一感慨。所以，他立志「筆下趨古風，直趣聖所存」（《夏熱晝寢感詠》）。他以復興古文爲己任，同穆脩、尹洙等提倡古文、歌詩，恢復和繼承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反對西崑派文人「更迭唱和」「雕章麗句」的形式主義風氣。「不敢雕琢以害正」，這就是他的宣言。與強調詩文創作的現實性和戰鬥性相應，他提倡豪邁闊放的藝術風格。在《題杜子美別集後》中，他推崇杜詩「豪邁哀頓」的藝術特色。《和子履雍家園》說：「君之襟尚我同好，作詩闊放莫可攀。」闊放，就是豪放，蘇舜欽本人創作的風格特點，就是豪放。他也主張藝術風格的多樣化，特別是在獲罪居吳後，也重視古澹質樸、清新自然的風格。《詩僧則暉求詩》說：「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翬。」《答章傳》又說：「扶疎珊瑚枝，本不自雕巧。」他決心以「不肯低心事鑄鑿，直欲淡泊趨杳冥」（《贈釋祕演》）的創作實踐，來抵制西崑派的浮靡文風。

蘇舜欽的詩文創作，就是他的文學思想與創作主張的實踐。他的創作，可以分爲三個時期。

早期（成進士前）

《宋史·蘇舜欽傳》說：「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他一反當時統治文壇的西崑派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浮靡風氣，以現實主義的內容和豪獷悲壯的風格嶄露頭角。這個時期涉世不深，是蘇舜欽創作的準備時期。

可定爲本期的詩，不足十首。

與上疏皇帝、指責弊政的政治活動相應，此期的詩作已初具現實性與戰鬥性。天聖七年（一〇二九），京師地震。蘇舜欽與其兄舜元作《地動聯句》，以漢人「天人感應」說作爲精神武器，把天災歸因於人禍：「念此大災患，必由政瑕疵。……天戒豈得慢？肉食宜自思！」并於「卒章顯志」，說明作詩是爲了向皇帝規諫。而在天聖末年寫的《感興》（後寢藏衣冠），則具體揭露了宋仁宗在各地修建神御殿的窮奢極侈，從秦始皇、漢宣帝、魏文帝一直批評到宋仁宗，從唐制一直批評到宋制，并明言寫詩揭露乃出於傷時憂民之熱忱：「蒼生何其愚，瞻歎走旁午，賤子私自嗟，傷時淚如雨。」明道元年（一〇三二）寫的《感興》（警說聖所擇），又以林書生上書直諫反遭迫害事，鞭撻了朝廷的暴政：「一封朝飛入，羣目已睚眦，力夫暮塞門，執縛不容喟，十手捽其胡，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繫灼若龜蔡，亦既下風指，黥而播諸海，長途萬餘里，一錢不得帶，必令朝夕間，渴飢死于械。」這些詩說明詩人的創作一開始就走上現實主義道

路，爲他以後致力寫作政治詩奠定了基礎。

寫詩悼念亡友，揭露那摧殘人才的社會現實。明道元年（一〇三二），主張文以載道、學習韓柳、反對西崑文風的穆脩病死。蘇舜欽兄弟作《悲二子聯句》，對穆脩、凌孟陽懷才不遇、貧病以死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向統治階級提出質問和詛咒：「長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莫解腹腸熱；……之子苟聞廁，斯民迺貪饕，高亢世弗親，方嚴鬼所掣。」有質問，有抗議，詛咒人是勢利眼，天和地也是勢利眼，詛咒世俗拋棄高尚之士，邪鬼專門掣肘正直的人，悲憤激切，譏刺逼人。

渴望建功立業，抒發懷才不遇之嘆。宋代特別重視進士出身，而不以蔭官爲滿足，詩人多次應舉失敗，故有《對酒》之作：

丈夫少也不富貴，胡顏奔走乎塵世？予年已壯志未行，案上敦敦考文字，有時愁思不可掇，崢嶸腹中失和氣。侍官得來太行顛，太行美酒清如天，長歌忽發淚迸落，一飲一斗心浩然。嗟乎吾道不如酒，平視哀樂如摧朽。讀書百車人不知，地下劉伶吾與歸！

懷才不遇而牢騷滿腹，狀志未行而借酒澆愁，既有「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的急切追求，又有一「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滿腔悲憤，以豪曠之筆抒崢

嶙之氣，氣勢橫絕。但他不象劉伶那樣逃避現實，他急於仕進是爲了致君澤民，因此，他也勸朋友應舉以濟世：「帝門急豪英，濟物無自子！」（《別鄰幾余賦高山詩以見意》）

此期之詩散佚較多，已難窺其全貌。五古寫國家大事，七古抒憤懣之情，已顯露現實主義精神和豪曠悲壯風格。《太行道》受有李白《蜀道難》的影響，既寫山勢之險，又寫世途之險，景象雄奇，氣勢磅礴，頗富浪漫主義色彩。五律《和解生中秋月》格律工穩，技巧已臻成熟。可定爲本期之文，只有幾篇。

蘇舜欽的散文，一開始就自覺地爲革新政治服務。《投匭疏》《火疏》批評皇帝，指責弊政，有強烈的政論性和戰鬥性，文筆犀利，言詞激烈，說理明快，敘事詳瞻，既無駢四儷六，亦無怪癖奇邪，已冲破西崑文風和「時文」的束縛，顯示出雄健質樸的風格。

中 期（成進士後至獲罪）

與前期相比較，此期詩作數量大增，題材、體裁豐富多樣，顯著的特點是政治詩量多質高，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得到高度發揚，豪曠悲壯與冷峻沉鬱的藝術風格已經完全形成。這個時期積極參加政治革新活動，是蘇舜欽創作的高潮時期。

可定爲本期的詩，近八十首。

爲民請命，反映人民疾苦。蘇舜欽認識到「民爲邦本」的道理，他「焦心憫疲農」（《淮上

喜雨聯句》)。慶曆三年（一〇四三）在汴京寫的《城南感懷呈永叔》，深刻地反映了農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與對立，他創作了一幅災難深重、餓殍遍野的難民畫，又描繪了一幅錦衣玉食、清談誤國的享樂圖，貧富對比鮮明，愛憎感情強烈。他慶曆元年（一〇四一）的紀實之作《吳越大旱》，可說是《城南感懷》的姊妹篇：

吳越龍蛇年，大旱千里赤；尋常杭稼地，爛漫長荆棘；蛟龍久遁藏，魚鼈盡枯腊；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城市接田野，慟哭去如織。是時西羌賊，凶饑日熾劇，軍須出東南，暴斂不暫息，復聞藉兵民，驅以教戰力。吳儂水為命，舟楫乃其職，金革戈盾矛，生眼未嘗識。鞭笞血塗地，惶惑宇宙窄，三丁二丁死，存者亦乏食。冤懟結不宣，衝迫氣候逆，二年春及夏，不雨但赫日。安得涼冷雲，四散飛霹靂，滂沱消浸癘，甘潤起稻稷，江波開舊漲，淮嶺發新碧，使我揚孤帆，浩蕩入秋色。胡為泥滓中，視此久戚戚，長風卷雲陰，倚柂淚橫臆。

此詩先寫天災，接寫戰禍，續寫暴政，把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雙重壓迫強加給人民的劫難寫得昧目驚心。這些血淚和墨之作，一掃西崑派文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烏煙瘴氣，高歌驚衆，振聾發聵。

反對侵略，表現愛國主義思想。北宋建國以來，一直處於遼和夏的威脅之下。自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夏末開戰至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宋夏議和，西邊戰爭頻繁，宋軍屢戰屢敗。蘇舜欽作爲一個富有反侵略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詩人，他想投筆從戎，但又有壯志難酬的慨嘆。《吾聞》寫道：

吾聞壯士懷，恥與歲時沒，出必鑿凶門，死必填塞窟。風生玉帳上，令下厚地裂，百萬呼吸間，勝勢一言決。馬躍踐胡腸，士渴飲胡血，腥膻屏除盡，定不存種孽。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斯時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晝臥書冊中，夢過玉關北。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如聞「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心聲，可說是一曲愛國主義的頌歌。報國有心，請纓無路，陸游筆底下常見的感情波瀾，蘇舜欽已開其先河。他未得機會去西北二邊，但時刻關懷着國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存亡。「有客論時事，相看各慘然。」（《有客》）「風波數破膽，時事一長吁。」（《九日泮中》）無論何時何地，他都念念不忘「國恥」。

批評朝政，指責時弊。在上諫致君的同時，蘇舜欽還通過懷古詠史之作，寫古今治亂的歷史教訓，以曲折的方式批評當朝皇帝。《望秦陵》指出秦亡漢興的原因是：「役重傾天下，時危啓